

都对美国的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①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百年来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理路探赜*

王格格 (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明治末期,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以科学性、阶级性、客观性的问题意识及方法论,不仅对日本史学发展产生广泛影响,更由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引介、改造与突破,在中国思想界产生重要反响,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学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一定关注,现有研究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日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一部分加以考察,^②或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事件、流派、成就与缺陷分而论之,^③亦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论述。但总体上看,既有研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的脉络梳理仍有补充与完善的空间。^④因此,整体透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审思其学术思想嬗变,对深入理解近代以来日本史学的学术动向和加强中日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

日本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文明史学”在诞生初即表现出唯物论倾向。1875年,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从物质条件方面来说明社会变动和发展原因,提出了实现文明的方法论。然而,“文明史学”在文化观念上仍以“西方中心论”为中心,存在服从既定观念、以论代史、重宏观轻微观等根本缺陷。自由民权运动兴起后,田口卯吉等有识之士主张打破“西方中心论”,运用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自由民权运动提供理论支持的同时,批判经济专制,强调货财与人心的“物心二元”的自由经济价值。田口史学对社会存在阶级关系已有一定认识,特别重视社会经济基础,以大米行情

① 美国学者威廉·卡里根(William D. Carrigan)曾全面分析了马克思对美国 and 北美史学书写的重要影响,参见 Q. Edward Wang, Georg G. Iggers, eds., *Marxist Historiograph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pp. 40-55。

* 本文为“首届全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青年论坛”参会论文,对会议评论人及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深表感谢。

② 代表性论著有,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岩波書店、1968年;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の史学 and 史観》、《日本史论文集》,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1982年版;坂本太郎:《日本の修史 and 史学》,沈仁安、林铁森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永原庆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3年;张经纬:《试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成田竜一『近現代日本史と歴史学』、中央公論社、2012年;户边秀明:《马克思主义 and 战后日本史学》,张艳茹译,陈恒、王刘纯编,《新史学》第27辑,大象出版社2021年版,第99—123页。

③ 代表性论著有,大門正克編『昭和史論争を問う:歴史を叙述することの可能性』、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邢科:《日本左翼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张艳茹:《日本史学史上的“昭和史论争”》,《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高燎:《唯物史观与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演变》,《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杨力:《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祁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日唯物史观比较》,《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张艳茹:《二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

④ 张经纬论述了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概况,但各阶段学术继承与发展的综合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参加张经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的涨落来观察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具有经济唯物论倾向。^①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发展,明治政府虽迫于压力承诺开设国会,但旋即对运动进行打压,快速构建起绝对主义体制。面对政府的急剧保守化,加之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弱点,福泽谕吉、田口卯吉等文明史学、自由民权主义学者选择转向进化主义唯物论、自然科学唯物论及保守的国家主义,“文明史学”式微。^②同时期,“实证主义史学”继承德国“兰克史学”如实直书、效忠君主和民族国家的史观,不仅十分契合明治政府建立官方史学的诉求,也与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共鸣,因而获得明治政府大力扶植,成为日本主流史学学派。^③

为取得与西方列强修约的机会,明治政府推行激进的欧化政策,导致国粹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抬头。在进步知识分子批判欧化主义,期望改造本国史学、重塑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一些史学家曾短暂向唯物史观靠近,但仍止步于进化主义唯物论、经济唯物论等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1887年,德富苏峰、山路爱山等继承文明史学传统,组建民友社,主张平民主义,成为“民间史学”的代表。他们更鲜明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和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然而在甲午战争前夕,德富苏峰转变立场,山路爱山等虽未转向,但始终对唯物史观存有认知缺陷。^④

甲午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劳资冲突、工人罢工事件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改良社会主义等学说传入日本,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应运而生。片山潜、幸德秋水、堺利彦等早期社会主义者开启了以唯物史观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先声。20世纪初,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逐渐关注阶级与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由改良式的非革命道路转向宣传革命道路。1901年4月,幸德秋水在《万朝报》公开声明信奉社会主义,随后在《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中,幸德初步论述了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概括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直指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和“产业预备兵”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神髓”在于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以社会主义取代帝国主义。与幸德相仿,片山潜断定社会革命的起点在于工人阶级力图夺取政权,而资本家却拒绝放弃政权。1903年,片山潜在《我的社会主义》中论及进化的社会主义时,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经济学领域考察近代工业发展的方法论深以为然,认为此举根本上推翻了传统经济学说,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出现是近代工业的发展进步。^⑤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虽在引介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方面率先垂范,但在日俄战争爆发后,由于组织内部分化不断,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的思想颇为游移,并最终由社会主义转向了无政府主义。此外,日本社会党党争也严重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为日本政府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机会。

① 鲍绍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② 宋成有:《明治初年“文明开化”运动中的三大矛盾》,《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进化主义唯物论”主张物质和精神都受自然法所支配,由宇宙自然法的真正本体所产生的一切现象都会绝对自然、绝对因果、绝对机械地发生。“自然科学唯物论”认为世界大势有进无退,是事物常理,进化就是由无形变有形,由不纯变纯粹。参见祁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日唯物史观比较》,《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

③ 据考,实证主义史家中,最早关注并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坪井九马三,坪井于1907年发表《作为史家的马克思》,认同马克思坚持事实调查的实证方法,推崇马克思揭示的经济对历史发展的意义。参见坪井九马三「史家としてのマルクス」,『史学雑誌』第18編第9号,1907年。

④ 鸣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东方杂志》17卷第19期,1920年;熊淑娥:《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对外认识》,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年版,第116页。

⑤ 岸本英太郎編『片山潜派の社会主义とその運動』,青木文库,1956年,72页。

1911年“大逆事件”中,日本政府大肆逮捕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处死幸德秋水等12名进步人士,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进入寒冬。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步入矛盾多发期,以内田银藏、福田德三、河上肇等大学教授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学”逐流而上。一方面,他们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到来的必然性;另一方面,由于深受近代日本资产阶级史观影响,其观点仍不免陷入进化论、机械论唯物史观的窠臼,对日本自身革命阶段的认识也较为保守。^①内田银藏是日本社会经济史学的开创者,其主张阐明经济对国民的经历、社会状态的变迁的影响,^②但其始终信奉进化史观,认为史学必须遵循客观实证主义的原则来探讨历史进化规律。福田德三曾师从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毕雪(L. Böhcher)和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归国后与吉野作造创建“黎明会”,成为大正民主主义先驱,致力于社会政策与阶级调和研究,主张通过合理的社会政策调和阶级利益,以实现真正的、全体国民的民主。^③对英美资本主义提倡的“民主”,福田道破其具有鲜明的阶级取向,本质是资产阶级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以获取人格自由和财产保障。^④对本国社会主义革命,福田却认为革命为时尚早,资本主义仍需发展。^⑤1922年,福田应邀赴北京大学演讲,提出人类一切事业的发达变迁均以经济为原因,而经济发达有一定顺序,^⑥反映出其秉持的经济史观,以及否认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跳跃。无独有偶,在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方面,河上肇与福田德三如出一辙。河上肇早期深受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E. R. Seligman)经济史观影响,将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归于经济关系。^⑦在《贫乏物语》中,河上肇开始探讨经济 and 精神的辩证关系,但同时又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来理解唯物史观,欠缺科学、客观立场。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日本席卷全国的“米骚动”爆发,河上肇的社会经济史学研究进入转变时期,他出版《社会问题管见》,创刊《社会问题研究》,编写《近代经济思想史论》,直至1921年出版《唯物史观研究》,他已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⑧但其对唯物史观的把握,仍停留在经济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层面而忽略了社会关系,亦少论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此外,河上肇主张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充分发展后才能实施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进化论、机械论唯物史观导致的消极理论。^⑨

明治维新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带有唯物史观倾向的日本新史学流派的发展,配合自由民权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大正民主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与组织基础。^⑩另外,日本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虽尝试取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但其理论参悟与诠释有如盲人摸象,始终限于对进化论、机械论唯物史观的坐而论道中,对革命

① 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与史观》,第438页。

② 内田银藏『内田银藏遗稿全集 第2辑 日本经济史の研究』下卷,原勝郎訂,同文館,1921年,367—413页。

③ 福田德三「社会政策和阶级斗争」,『福田德三经济学全集』第6卷,同文館,1926年,763—764页。

④ 杉原四郎『日本经济思想史』,関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71页。

⑤ 福田德三『黎明録』,佐藤出版部,1919年,875—876页。

⑥ 福田德三:《马克思主义底根本思想特别注重其与布尔塞维克之关系》,《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10月17日。

⑦ 河上肇:《河上肇自传》上册,储元熹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1页。

⑧ 河上肇:《河上肇自传》上册,第130—183页。

⑨ 『櫛田民藏全集 第1卷 唯物史観』,改造社,1947年,22、217页。

⑩ 张经纬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史学流派难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其中也多少存在一些与唯物史观相吻合的进步因素,正是这些进步因素在日本史学界的长期浸润,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移植生根和传播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参见张经纬:《试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多持消极否定态度,因而未能掌握唯物史观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精髓,也没有划清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二、日本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日本共产党成立前,工农运动均以失败告终,使日本社会主义者痛感科学理论的缺乏。日本共产党成立后,针对之前盛行的革命尚早论、否定政治论,党内理论家山川均提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标志着山川主义开始形成,并成为日共早期指导思想。山川提出,面对资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必须从消极否定向积极斗争转变,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从少数者运动向大众运动转变,^①体现了进步势力掌握社会主义运动主导权的决心。但日共甫建未及一年,即遭遇日本政府的大搜捕,在风雨飘摇之下于1924年3月自动“解散”。

白色恐怖期间,党内理论家福本和夫开始对山川主义进行批判。福本强调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并非机械式的转换,只有在理论斗争中才能获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建立先进的共产党,实现所谓方向转换。^②此外,福本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及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并批判河上肇的唯物史观是抽掉唯物辩证法的机械论唯物史观,^③河上肇也开始清算自己过往的观点。在《社会进化论》中,福本又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来解读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进而确立了其唯物辩证法本体观。^④1925年至1927年,福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诠释形成了福本主义思潮,取代山川主义成为了日本共产党的指导方针。

1926年12月日共恢复重建,次年,共产国际为日共制定了《二七年纲领》,不仅批判山川主义及福本主义,强调建立统一战线,更明确指出日本的革命是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一经发布,即引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日本革命路线问题的激烈论争,显现出由革命尚早论向革命阶段论过渡的趋势。1926年起,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野吕荣太郎陆续发表一些关于日本革命的观点,其见解与《二七年纲领》近乎一致;1930年,其专著《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正式诞生,野吕也成为拥护日共纲领的学派“讲座派”的代表人物。^⑤同一时期,猪俣津南雄等“劳农派”知识分子自立于日共中央外,两派在政治纲领与革命路线上产生分歧。争论首先围绕日本资本主义的阶段问题展开,对于猪俣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能通用于日本的论调,野吕指出日本是一个残存半封建制的国家,革命的当前任务必须先拔除封建的盘根,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引向社会主义革命。^⑥

20世纪2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日共党员脱离了进化论及机械论唯物史观的桎梏。1927年,上

① 山川均「無産階級運動の方向転換」、『前衛』1922年第7・8期。

② 北条一雄「方向転換」,白揚社、1927年,4頁。

③ 福本和夫「唯物史観と中間派史観」,希望閣、1926年,64、173頁。

④ 蔺淑英:《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创造性运用1919—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5—156页。

⑤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野吕荣太郎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诞生的标志。参见张经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历史学》,王新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2—87页。

⑥ 山越珑:《狱中狱外二十五年》,郑宏述、孙青译,文光书店1952年版,第190—197页。

田茂树在《世界历史》中,探讨了世界历史的三个属性,即革命性、学术性、进化性,建立了清晰的唯物史观逻辑链条。^① 1928年至1929年,社会经济史学代表人物对过往唯物史观的认知缺陷进行了集中修正。然而,囿于认知水平和条件仍不成熟,有些只是表面上对唯物史观的生搬硬套。例如,1928年,日共党员佐野学在其所著《日本历史》中,开篇即言历史与现实生活利益、阶级利益牵涉最深,又言其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②但在论及明治维新的性质时,其将明治维新简单等同于资产阶级革命,忽视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和复杂性,受到经济史学家守屋典郎的批评。守屋直指佐野的见解显然是公式主义的,其仍然在早期资本主义理论及机械论唯物史观中原地踏步。^③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深陷危机之中,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接近完成,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后果,使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强烈震动。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共产国际面对国际形势变化指导日共制定了《三二年纲领》。该“纲领”指出日本的军事冒险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强调日本统治制度的特征是专制主义天皇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垄断资本主义三种因素的结合。因而,天皇是地主和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日本革命的首要任务是粉碎天皇制国家机制,并确定当前日本革命的性质是“具有必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倾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④

围绕日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问题,“讲座派”与“劳农派”展开论争,双方以明治维新为起点,在明治维新性质问题、明治维新后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封建因素、日本天皇制等方面的认识和意见相左。“讲座派”以野吕荣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学者为代表,他们拥护日共纲领,认为明治维新的基本性质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天皇绝对主义、日本资本主义、寄生地主制的构造结合,是“变革”而非革命。日本资本主义在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确立的同时即转化为帝国主义,它是一种军事的、半农奴制的资本主义。“讲座派”进而提出天皇制法西斯论,认为这种体制在维护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同时发挥着法西斯主义功能;“劳农派”以山川均、猪俣津南雄、栉田民藏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反对日共纲领,认为明治维新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后的农业生产关系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近代土地所有制,天皇制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度。^⑤ 总体而言,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日本历史上经过了哪些社会形态、“东方”与“西方”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成为论争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两派学者虽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原理与方法来解释历史事实,但始终在上述问题莫衷一是,即使“讲座派”正确揭示了明治维新的性质,但在理论阐明方面却存在长期缺失。

正当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争论中焕发学术生机时,军国主义思潮大肆泛滥,意识形态领域风声鹤唳,日本工农运动遭受沉重打击,大批左翼进步知识分子被迫选择“转向”。^⑥ 1933年6月,被捕入狱后判处无期徒刑的日共党员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发表“转向声明”,宣布弃信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的佐野和锅山认为,日本共产党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看似进步而实则有害的废除君主制的口号,这是根本错误。佐野等人发表了反对共产国际、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和天皇制的声明,彻底

① 上田茂樹『世界歴史(無産者自由大学;第5講座)』、南宋書院、1927年。

② 佐野学『佐野学集 第1(日本歴史研究)』、希望閣、1930年、13—19頁。

③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吕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4—256页。

④ 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6页。

⑤ 日本经济劳动研究所编:《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金学成、卫瑜译,中国建设印务股份有限公司1948年版,第29—105页。

⑥ 德田球一:《德田球一自传》,松筠译,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79—80页。

背离马克思主义,造成日本共产党的极大震动,日共党员出现大规模“转向”。^①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受到强力压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亦遭受残酷的人身迫害。1933年,河上肇被捕入狱,被判五年徒刑。同年,野吕荣太郎被捕,次年2月在狱中牺牲。^②1936年7月,日本政府指责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羽仁五郎、小林良正等“讲座派”学者企图在日本发挥“苏联共产科学院”的作用,将他们逮捕入狱,“讲座派”濒于崩溃。“劳农派”也因“人民阵线事件”“教授集团事件”而被搜捕殆尽,“资本主义论争”因此被迫中断,方兴未艾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被扼杀。^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扼杀国内进步势力与厌战、反战言论,确立战时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平泉澄为代表的“天皇史观”与军国主义沆瀣一气,独霸史坛,史学沦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思想教化工具,马克思主义进步史学不得不转入地下。1938年2月,由进步学者户坂润、永田广志等人发起的唯物论研究会被迫解散,户坂润被日本当局害死于狱中,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陷入停滞。^④1941年至1942年,日本史学界举办“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强调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就是对内实行超越个人的统制经济,对外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⑤京都学派也以“世界史哲学”构思“大东亚共荣圈”,走上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⑥至此,战时日本史学界再无进步史学的立身之地。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到初步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方面配合共产国际和日共制定的纲领,为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提供理论武器,获得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另一方面,修正了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缺陷,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但是,由于理论认识的不透彻及信仰不坚定,在日本政府的思想压制之下,学问的自由屈服于政治,有的学者甚至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由此既反映了近代日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与软弱,也透露出其对共产主义暂时未能实现社会变革的失望,这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上的时代阵痛。

三、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

1945年10月,日本政府废除《治安维持法》,释放政治犯,日本共产党也开始战后重建工作。1945年底,日本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史学家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力图克服在战时成为侵华借口的“亚洲停滞论”,分析以天皇制为基础的近代日本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扭曲和问题,批判近代日本的后进性与特殊性,探寻日本内在发展的可能性。^⑦

随着日本社会的逐渐稳定,国民开始反思历史,希望能够看清历史真相。因此,无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近代主义史学家,在探索日本内在发展可能性的过程中都发出了对主体性解放的呼吁。^⑧

①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金锋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0—181页。

② 山越珑:《狱中狱外二十五年》,第197页。

③ 日本经济劳动研究所编:《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第110页。

④ 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三笠書房,1938年,13—14页。

⑤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上卷,黄大慧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87页。

⑥ 王振涛:《二战前后日本知识界的思想转向及其反思》,《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3年第8期。

⑦ 成田竜一『近现代日本史と歴史学』,中央公論社,2012年,3—4页。

⑧ 1946年6月,历史学研究会确立的总纲领中,更为强调历史研究的人民立场,并呼吁历史学家将研究成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参见张艳茹:《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

近代主义史学家大塚久雄对日本战后的改革表现出强烈危机感,认为只有培养近代的、民主的人,才能由主体解放走向生产力解放,进而实现国家的内在发展。^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石母田正主张了解自身历史是实现主体解放的原点,他鼓励民众自主考察,书写所在聚落和工场的历史。^②

战后,东京审判本应裁决日本战争责任者,但由于天皇得以免罪,阻塞了日本国民要求追究真正责任者的言路。1949年,历史学研究会将“各社会构成的基本矛盾”作为年会主题,次年出版年会记录,题为《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成为战后初期日本历史学界的主流问题意识与方法论,^③继承战前“讲座派”史学传统的新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证明天皇及天皇制的战争责任。1953年,井上清在《日本的军国主义》一书中并没有把军国主义当成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从当时日本具体历史条件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来分析军国主义产生和覆灭的规律,从日本军国主义同其他上层建筑与社会现象,如天皇制、官僚独裁政权的确立、兵制改革等相互联系中考察日本军国主义的特点。^④

在批判天皇史观、呼吁主体性解放和追究战争责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近代主义史学家恢复了被军国主义歪曲了的历史观,共同开启了日本“战后历史学”时代的到来。^⑤由于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联合国军的占领政策等,证实了战前“讲座派”理论的正确性,因而继承“讲座派”史学传统和主要理论的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在社会上也被广泛接受。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共产党与占领军的矛盾日益加深,基于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判、强化自身立场需要,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进行历史学改造。其一,提出历史研究是民族各阶层向民族化集结的一种手段的民族主义论调;^⑥其二,组织《太平洋战史》的写作,明确十五年战争^⑦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解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之间的关联,批判战时回忆录类书籍中为自身辩护的现象;^⑧其三,推进“国民的历史学运动”,以历史研究的成果启蒙国民,与生活记录运动相结合,提倡书写“母亲的历史、职场的历史”,支持民众自身成为书写历史的主体。^⑨但是,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很多运动并未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仅是对日共“为民族解放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方针的呼应。^⑩

1955年后,日本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日共对左倾盲动主义进行了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

① 大塚久雄「近代人間類型の創出一政治の主体の民衆の基盤の問題」、『大学新聞』第57号、1946年4月11日。

② 石母田正「村の歴史、工場の歴史」、『歴史評論』1948年第12号。

③ 歴史学研究会編『世界史の基本法則—歴史学研究会1949年度大会報告』、岩波書店、1950年。

④ 参见井上清『日本の軍国主義 第1(天皇制軍隊と軍部)』、東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井上清『日本の軍国主義 第2(軍国主義と帝国主義)』、東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

⑤ 户边秀明:《马克思主义和战后日本史学》,第104—105页。

⑥ 藤間生大『日本民族の形成—東亞諸民族との連関について』、岩波書店、1951年、292—293页。

⑦ 1956年1月,日本哲学家鹤见俊辅于《中央公论》发表《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首次提出“十五年战争”这一说法,认为应该将1931年到1945年的一系列战争进行统一命名。这种历史观特别强调,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战争是连续的、密不可分的,中国大陆是主战场,最终取得胜利的是中国人民。参见伊势弘志、葛睿:《日本“十五年战争”论的前世今生》,《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⑧ 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岩波書店、1968年、124頁。

⑨ 民科歴史部会総括委員会「民科歴史部会活動総括(案)」、『歴史評論』1967年第200号。

⑩ 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73—128頁。另外,张艳茹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家发起的“国民的历史学运动”,特别重视历史对国民教育的影响,以期通过历史研究、历史教育让民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这些运动虽然在1956年前后遭遇挫折中止,但无疑对培养民众的历史意识有促进作用。参见张艳茹:《二战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

也遭到质疑。1955年11月,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共著的《昭和史》出版,该书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阶级分析方法解析1926年至1954年的日本历史全貌,将以日共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对抗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指出了战争的必然性和应由统治阶层承担战争的主要责任。^①次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通过这次批判,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自由解释基础上的多元化倾向。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率先对《昭和史》一书进行批判,近代主义史学家丸山真男、和歌森太郎等也加入批判行列。他们的主要观点为,《昭和史》呈现的唯物史观缺乏时代共情;缺乏对国民的剖析,只用阶级斗争概念把军部、政治家、实业家、共产主义者等进行分类,排除了历史的复杂性;缺乏对“人”的描述;以非黑即白的两分法看待战争责任问题;易受外部政治影响。^②对此,远山茂树重申了他所主张的历史科学观,同时强调历史学家应站在变革及民众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批判者的质疑。^③

“昭和史论争”逐渐平息后,^④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质疑与日倍增,在冷战背景下,美国的“近代化论”在日本传播开来并成为新热点,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阶级斗争史观等方面做了努力探索。例如,芝原拓自不再以阶段发展论来看待日本社会,开始强调日本社会类型与环境条件的特殊性,指出日本属于从属型资本主义,侵略亚洲是日本维持独立性的手段之一,国民对战争的支持是日本资本主义下的必然性结果。^⑤1962年起,井上清、家永三郎、石母田正、远山茂树、中冢明等合作编写《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不再采用政权更替式的分期法,而是按照社会形态史进行时代划分,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以亚洲为媒介,从近代化比较史的角度来思考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并基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视野将战前和战后作为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来看待。^⑥

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视线投向作为历史主体的民众及作为个体的“人”的问题,进入民众史研究时期。1967年,青木美智男提出“人民斗争史观”,发展替代了在“昭和史论争”中饱受诟病的“阶级斗争史观”。^⑦以此为基础,色川大吉首倡“民众思想史”,着重研究人民斗争中民众思想的变化情况。将民众思想史进一步发展的是安丸良夫,其注重研究日本近世和幕府末期人民运动中民众思想的发展变化,尝试描述民众的主体化形象,并探求其动力来源。他提出“通俗道德论”,将通俗道德作为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整体构造。安丸认为近代日本社会的普遍意识,是在人的主体性参与过程中形成的,而民众思想的形成是主体意识形成特点的集中体现。^⑧1974年,门胁祯二、佐佐木润之介、中村政则、藤原彰等联合编撰了《日本民众的历史》一书,记述了从日本古代到近现代民众思想的变动情况,从多个视角出发描述了日本民众的思想状态与人民运动,批判了日本文部省的国家主义史观及其对历史教育的破坏。1976年,谷川道雄提出“共同体理论”,力求从人的意识来理解社会关

① 远山茂树、藤原彰、今井清一『昭和史』、岩波新書、1955年、2頁。

② 永原慶二『歴史学叙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69頁。

③ 远山茂樹「現代史研究の問題点——『昭和史』の批判に関連して」、『中央公論』1956年6月号。

④ 论争到1956年年底逐渐平息,在持续近一年的论争中,双方都没有真正认同对方的观点,在理解对方观点的上也有错位,论争没有具体结果。参见张艳茹:《日本史学史上的“昭和史”论争》,《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⑤ 芝原拓自「明治維新の世界史的位置」、『歴史学研究』1961年(別冊)、39、51—55頁。

⑥ 成田竜一『近現代日本史と歴史学』、266頁。

⑦ 須田努『イコンの崩壊まで「戦後歴史学」と運動史研究』、青木書店、2008年、170—171頁。

⑧ 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衆思想』、青木書店、1974年、10頁。

系,认为在阶级对抗外存在阶级调和。^①同一时期,藤原彰、江口圭一、永原庆二等围绕“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点展开论辩,使其更加深刻体会到民众主体性的积极意义及市民价值观的重要性。^②此外,民众史批判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通过研究精英思维变迁来透析思想近代化的日本思想史,以及从“民族”“人民”等变革主体群像中还原民众期望的“讲座派”理论,从而使地域史和妇女史研究真正开展起来,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③但是,民众史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和人民内部阶级成分的复杂性,带有偏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倾向。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为打破战后历史学的停滞,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对战后历史学进行整体探讨和反思,继而进入社会史研究时期。网野善彦、阿部谨也、二宫宏之、喜安朗等引领了社会史研究的热潮。社会史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轴,宣告了宏大叙事的终结,尝试从日常细节、人际关系等层面来考察历史,^④并主张历史构造主义,即所谓历史不是过去事件的还原,而是因解释而存在的。^⑤虽然社会史学者批判“讲座派”的历史观,但他们又同时认为自身仍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顺应时代潮流,在1986年出版八卷本《日本社会史》,讨论民众的世界观及其与社会的结合程度。社会史研究的持续活跃,也昭示着日本史学界以“战后历史学”为中心的史学版图开始发生变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全球化的加速等,西方新晋史学理论不断涌入日本,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亦随着新一轮的欧风美雨强势渗透,^⑥此外民主制度已在日本确立下来,随着日本中产阶级的扩大,“阶级社会”观念也销声匿迹,改变了日本近代史的叙事走向;^⑦与人民运动紧密相连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失去了研究需求和创新动力,逐渐丧失了在日本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但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放弃自我更新,在对已有史学理论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同时,融入日本现代历史学发展的时代洪流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藤原彰、今井清一、江口圭一等投入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对抗中,自觉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帝国”与“殖民地”的史学书写,更新了对重要历史事件的解读。此外,加藤阳子《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等女性学者的著述突破传统史学范式,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日本近代战争逻辑分析及日本妇女解放实践,深刻揭露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陷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左派学会——历史学研究会,其年会主题也始终紧跟世界潮流及社会热点,尝试以历史研究为当下提供借鉴与经验启示。

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的关键问题进行复盘反思。2023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年会召开之际,编辑出版了《“战前历史学”的竞技场——历史学家的1930年代》。其中,马场哲、前田亮介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左派外交史学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学研究会的

① 参见李磊:《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之路》,《许昌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② 参见教科書検定訴訟と支援する歴史学関係者の会編『歴史の法廷——家永三郎教科書裁判と歴史学』,大月書店,1998年。

③ 戸邊秀明『マルクス主義と戦後日本史学』,『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第22巻 歴史学の現在』,岩波書店,2015年,156頁。

④ 二宮宏之『全体を見る眼と歴史学——二宮宏之著作集 第1巻』,岩波書店,2011年。

⑤ 成田竜一『歴史学のポジションリティー——歴史叙述とその周辺』,校倉書房,2006年,206頁。

⑥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苏联解体、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意识发生剧变,日本学界对“近代化论”开始提出种种质疑,对战后历史学的批判和反思也逐渐增多,史学研究呈现新的动向和面貌,学界的问题意识、关注点、研究方法等开始发生变化。参见张艳茹:《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明治维新史研究动向》,《聊城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⑦ 坂野潤治『〈階級〉の日本近代史:政治的平等と社会的不平等』,講談社,2014年,7頁。

关系等方面,分析了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史中的影响。^①此外,大门正克、户边秀明、矶前顺一、须田努、三村昌司等学者的研究,分析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曲折发展后落莫的原因,即以“世界史的法则”与“变革性主体”构成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主导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西方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下,日本史学界批判否定了“世界史的法则”,而“主体”经历了从倒退、解体到回归的循环往复,这是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有矛盾,确实值得反思与研究。

结 语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轫于明治年间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经过对唯物史观研究的展开,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逐渐以唯物史观指导革命实践,并运用唯物史观开展研究,其发展理路带有强烈的移植性、战斗性与现实性。尽管一度因教条主义、机械主义而遭受抨击,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不断省思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成为日本战后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派别。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及日本社会思潮的迅速转变,马克思主义史学趋于保守,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理论冲击下,被竹内好、子安宣邦等学者的亚洲主义研究和望月清司等学者领衔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代替,丧失了原本强势的学术话语权。此后,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及学派难觅其踪。面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部分日本学者开始呼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性回归。如何重新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培养的批判性与思想性机能、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交流对话、如何以学术介入当下中日关系发展,日本史学界面临新的省思与挑战。

独立后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与局限*

——以阿里格尔学派穆斯林王朝史研究为核心的考察

张恣煜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一、引言

2023年4月,印度国家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以下简称“国家教培委”)修订了第三版历史教科书,删减了莫卧儿王朝的部分内容。印度独立以来,国家教培委教科书已经对争议最多的莫卧儿史部分进行了数轮修订。如何书写莫卧儿史

^① 参见歴史学研究会編・加藤陽子責任編集『「戦前歴史学」のアーリーナ——歴史家たちの一九三〇年代』、東京大学出版会、2023年。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印度政教关系史视野下的《治世之道》研究”(项目编号:23YJCZH297)的阶段性成果。